

姜洪主编：城市经济改革研究丛书

# 经济改革：苏联、 东欧和我们

王跃生 韩 实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城市经济改革研究丛书

---

# 经济改革：苏联、 东欧和我们

王跃生 韩 实

责任编辑：李永平

封面设计：陈 乾

经济改革：苏联、东欧和我们

王跃生、韩 实 著

•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北京广内印刷厂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 字数：130 千字

1987年4月第一版 1987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定价：1.20元

统一书号：4395·81

## 丛书说明

中央领导同志一再指出，当前在我国正在深入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是一场革命。

正如任何一场革命一样，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也十分需要理论。尽管理论与实践并不一定齐头并进，有时实践还会走到理论的前面，例如前几年我国农村的改革便是如此。但如果我们不能对改革的实践加以理论上的研究，对今后的改革加以理论上的指导，那么实践的脚步也就会放慢，甚至停顿。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的改革进入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新阶段。城市改革与农村改革有着十分不同的特点，城市是大工业的集中地，是国家政治、经济机构的所在地，是原有体制的大本营。要对复杂的、有着内在联系的旧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离开了经济科学、哲学、社会学的深入探讨，离开了古、今、中、外的比较研究，离开了各种观点和方案的百家争鸣，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说农村的改革要求社会科学工作者不断地拿出生动、新鲜的调查报告来不断推动改革的话，那么城市的改革仅此就远远不够了，它更需要大量的理论分析、学术探讨、方案比较以及思潮碰撞。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和北京经济研究所的帮助下，在多次的城市经济改革讨论会的基础上，形成了编写、出版《城市经济改革研究丛书》的基本构

想。

本丛书力图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教条出发；

本丛书力图侧重理论探索，而不是他人编述的整理；

本丛书力图以立论取胜，而不以材料丰富为长；

本丛书力图风格多样，而不求体例上划一。

在近百选题中我们精选了二十余个选题，争取在1986年出齐。

必须说明的是，尽管丛书中的各个作者有着相同的倾向，近似的学术观点，尽管编委会安排的学术交流和编者、作者的切磋，消除了一些不同点和误解，深化了大家的认识，但各个作者仍有着对理论问题的不同看法。编委会本着百家争鸣、实事求是的态度将这些差异都保留在丛书中，在这些地方，这些独特的观点既不代表编委会的看法，更不代表其他作者的意见。我们相信读者将会喜欢这种做法。

探索不可能是完备的，唯其不完备才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如果本丛书的出版，能够引起各界的关心和批评，我们就会为能够推动对改革进一步的理论探索有所贡献而欣慰。

## 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五年六月

## 序

记得有位外国的大经济学家曾把文字的出版说成是作者的狂妄自大。如果说这是一种自谦的话，那么，他的话却使我们在出版自己的文字时感到惴惴不安，特别是，我们的出版物与世界许多大经济学家研究着同样的课题。

的确，世界上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书籍成千上万，可谓汗牛充栋；在国内，这类题材的出版物也已相当可观。这些著作，当然没有穷尽这方面的主题，但却也没有留下一块尚无人问津的“处女地”。看来，要在这类著作的行列中增加一本有特色的书籍，对我们来说，确乎过于艰巨了。不过，我们仍然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争取能在下述方面使本书具有特点。

第一，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联系。我们以为，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是否深入彻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前的理论准备的深度，取决于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论认识的深度，浮浅的、表面化的认识所能产生的只能是零散的、难以为继的改革方案和措施。鉴于此，我们在本书中用相当的篇幅再现了苏联和东欧各国经济改革中激烈的理论论战、对传统理论和传统体制的批判，并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问题加以探讨。

第二，注重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分析。对经济机制的深入

分析离不开经济主体（计划机构、企业等）行为方式变化的分析。对于企业经营目标、经营环境及在外界条件下反映方式的变化分析，是我们分析经济机制的重点。因为从行为方式上去把握企业的变化，有助于对各种模式下的经济现象形成切切实实的认识，而不是缥缈迷离的印象。

第三，不忽视改革时期的过渡性因素。改革时期的经济有别于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和纯粹市场经济，而且也不是简单地趋近于二者中的任何一者。在对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的分析中，虽有所侧重，但都涉及其过渡性因素，因为在其中可能已经孕育着新体制的雏形。

第四，注重外国经验同中国情况的直接比较。对外国经验的任何专门论述当然都为中国的改革提供了借鉴，但直接将中国同外国比较则更有其价值。故，我们尝试着把中国的情况与苏联东欧的情况做了某些直接对比。自然，这种比较应是有其理论中介，而不应是生搬硬套的。

本书除第一章经济论战和第四章关于我国情况的分析外，在第二、第三两章，我们从三个层次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进行了评述。第一个层次，具体介绍改革过程；第二个层次，评述三种体制下的经济机制；第三个层次，较抽象地对三种模式进行分析比较，并就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理想模式进行一些探讨。自然，后面一部分的内容具有很大尝试性。

鉴于已有的对苏联东欧经济改革的大量介绍，对其它著作论述较详的则略之，略处则详之。考虑到农业体制问题的专门性，本书一般未涉及农业方面的问题。

上述想法都只是作者的一厢情愿，考虑到作者在理论素

养、学术功力上的欠缺，及时间的仓促，这些想法恐难完全实现。在改革潮流中兴的时刻，我们觉得，与其“十年磨一剑，”搞出一个尽善尽美的东西，不如先把这个不成熟的东西交给读者，以应改革之急需，也算我们对改革时代所尽的绵薄之力。

我们期待着学术界前辈及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作者衷心感谢李永平、朱晓忠、平新乔等同志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的支持与帮助。

作 者

一九八五年七月

于北京大学

# 目 录

## 序

### 第一章 改革到来之前:

政治背景和经济论争..... 1

第一节 政治背景..... 2

第二节 对传统经济体制的重新认识..... 7

第三节 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问题的讨论..... 12

第四节 改革建议和经济运行理论..... 20

### 第二章 三个十年: 苏联东欧经济改革

的实践..... 29

第一节 工人自治——南斯拉夫的创举..... 30

第二节 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匈牙利的  
榜样..... 53

第三节 苏联: 传制体制的变通..... 89

第四节 七十年代的回潮..... 118

### 第三章 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 125

第一节 改革者面临的迫切问题..... 125

第二节 模式问题..... 140

第三节 计划与市场..... 153

|                       |     |
|-----------------------|-----|
| 第四章 大转变中的中国经济.....    | 169 |
| 第一节 当前经济中的某些问题.....   | 171 |
| 第二节 理论运行模式与中国的现实..... | 178 |
| 结语：第四种模式？ .....       | 187 |

# 第一章

## 改革到来之前：

### 政治背景和经济论争

1956年，在苏联和东欧各国抨击现行经济体制种种弊端的言论，明显增多了。其中，以来自波兰和匈牙利这两个中等发达程度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批判最为直言不讳。这一次，批判的浪潮席卷了几乎东欧的所有国家，与几年前南斯拉夫一国孤军备战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批判是针对经济中的现实问题展开的。然而，其时经济现实中的问题并未激化，相反，按照衡量经济实绩原有的标准，当时的经济状况是比较乐观的；1956—1959年期间，在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保有一个高速的增长率，国民收入增长率几乎不低于以前的几年。

我们不得不去寻找一下这场经济论战的非经济原因。

## 第一节 政治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红军解放了大多数被法西斯占领的东欧国家。八个人民民主国家战后先后在东欧成立。恢复时期，各国依次实行了土地改革和工业、银行、自然资源的国有化。1947—1948年，大多数东欧国家制定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此后又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但是，以后成为改革对象的苏联式经济体制在战后的东欧并非一下子就确立了下来。“冷战”爆发之前，更确切地讲，是在苏南冲突之前，东欧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享有较多的自由。国际上，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虽不愿看到东欧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但认为东欧各国可以是同苏联友好的非斯大林主义国家。苏联亦不愿同西方大国发生冲突。因而在加强对东欧的政治、经济影响的同时，允许东欧各国在政治结构上保留与苏联形式上的差别。与苏联不同，战后初期的东欧各国中，共产党（或工人党）尚未掌握全部政权。各国官方极力表示本国政权的过渡性质，说它在纯粹的意义上，即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强调人民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差别，同时，也强调自己的制度和政策同苏联的根本区别。当时，一些东欧国家领导人<sup>v</sup>大谈本国、本民族的特点，崇尚民族社会主义，声称，苏联的道路不仅现在不走，将来也不走。

1948年，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提出走“波兰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同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斯兰斯基，倡导“独特地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匈

牙利内政部长卡达尔及农业部长纳吉也强调，要结合本国的特点建设社会主义。这种桀骜不驯的性格，在自己直接领导二次大战期间本国抵抗运动的国家领导人身上，则表现得尤为突出。

丘吉尔一纸冷战宣言，加之杜勒斯主义的出笼，使东西方关系骤然恶化。苏联不仅自己抵制马歇尔计划，而且不准东欧国家接受“美援”，同时加快了对东欧国家的政治整肃进程，不准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有不同于苏联的言行存在。不仅将坚持己见的南斯拉夫逐出共产党情报局，并以“反对铁托的民族主义偏向”为名，在东欧其他国家发动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判，清洗各国党内“国内派”中与铁托有相似主张或作法的领导人。哥穆尔卡在他提出波兰道路的同一年，被撤销波党第一书记的职务，1951年被捕入狱。1949年，科斯托夫被指责怀有民族主义和反苏情绪，被开除出保共政治局，并被解除副总理职务。匈牙利外长拉伊克·拉洛被审判。卡达尔也因“右倾”和“民族主义”罪名入狱。1951—1953年，“莫斯科派”成了最后一批清洗对象，其中最著名的是捷克的“斯兰斯基案”，其罪名是“捷克民族主义”和从事间谍活动。实质上，被清洗者的共同“罪行”是他们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强调过要走民族社会主义道路。

此间，人民民主的独特性被斥之为“民族主义”，一党制取代了几个党派之间的政治联合，政治制度上的多样性随各国新宪法的颁布而消失。新宪法仿照苏联1953年宪法制定，所采纳的是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作为“传递机制”的概念。

东欧经济体制上的苏联化略早于政治体制。苏联经验是当时在世界上仅存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东欧各国的第一个

五年计划几乎都是在苏联顾问的参与下制定的。从此，苏联式经济体制的全部特征，以及苏联式的整个经济发展逻辑在东欧各国几乎无一例外地再现出来，苏南冲突之前的南斯拉夫也不例外。

苏联经验基本形成于工业化时期，但采纳苏联经验的东欧各国并非全部面临工业化的任务。的确，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巴尔干国家，战前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工业化问题对于这些国家比对匈牙利和波兰等国家更为迫切，而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的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在战前便已经可与第一流的工业国家相比拟。尽管如此，人民仍不能否认苏联经验对东欧各国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所起过的积极作用。连改革时期最激进的批评家对此也不否认。然而，政治事变毕竟是发生了。那是在斯大林逝世前后。

1953年，政治清洗在捷克斯洛伐克尚未告终，政府又宣布实行币制改革，受害者愤怒了。6月1日，波西米亚西部工业城市比尔森的斯柯达汽车工厂工人用重型卡车撞开工厂大门，游行直抵市政厅，抗议币制改革，发泄不满情绪。战后处于特殊地位的民主德国也出现不稳定状态。市场供应奇缺，物价飞涨，是不稳定的经济原因。斯大林逝世后，不安定局面更加严重。德统一社会党宣布“新方针”，放慢工农业社会化速度，旨在缓和紧张局面，但未见成效。（同时，党内争论随苏联国内局势变幻而起伏，并形成了由国家安全部长蔡塞尔及《新德意志报》主编赫恩施塔特领导的与乌布列希对立的集团。）一五期间（1951—1955年）国营成份的迅速扩大，计划指标不切实际，劳动定额过高而工资未能相应提高。引起人们的不满。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和其它

271个地方出现骚乱。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1955年访问南斯拉夫，承认南斯拉夫的自治道路，并认为它与苏联的道路异曲同工。这次访问是自1953年以后对东欧国家的第一次冲击。第二次，也是更大的一次冲击，来自赫鲁晓夫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虽然一些国家的骚乱在一定程度表现出人们对苏联式政策的不满，但全面揭露旧体制的弊端，甚至攻击领袖人物，仍出乎人们的意料。秘密报告给东欧带来的首先是惶惑。隔了一段时间才对冲击作出反应。

对于社会主义首创精神受到普遍压抑的东欧国家，苏共二十大的冲击，有助于加速解决积累下来的矛盾。而在波兰和匈牙利，这一进程最具爆炸性。

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市切卡爾斯基工厂工人上街旅行，并与军警发生流血冲突。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全体成团在这次冲击下。集体辞职，哥穆尔卡重新上台执政。

同年10月，匈牙利成千上百的工人、知识分子、学生及部分士兵，上街游行，抗议拉科西新的大清洗计划，要求恢复纳吉的政府职务，公布苏联开采匈牙利钠矿等对外贸易协定。游行队伍同保安部队发生大规模冲突，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拉科西及格罗先后下台，由卡达尔出任第一书记，纳吉任总理，劳动人民党易名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

动乱中，波匈人民提出改变苏式经济政策和改革政治体制的要求。不久，波兰提出了“社会主义及人民掌权原则下的生活民主化”纲领，制定了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如“人民政府制度”“工业组织制度”等。更为重要的是，两国继南斯拉夫之后，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首次对苏联经验提

出挑战。波兰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是“特殊情况下的社会主义。”哥穆尔卡在八中全会上指出，社会主义可以是在苏联产生的那样，也可以是在南斯拉夫见到的那样，还可以是别的不同形式，即社会主义的模式应当是多种多样的。八中全会决议指出，机械抄袭和搬用别国经验是不正确的。匈牙利的伊雷姆·纳吉也指出，把苏联的经验说成是到处有效的、唯一正确的和有约束力的原则，这会给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发展带来特别严重的困难，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匈牙利独特的国情相结合。”

动乱平息后，两国都表示了进行经济改革的愿望。在波兰，起草了经济改革草案。哥穆尔卡在1956年和1957年两次提出改革：工农业自治，中央计划与适度自治相结合等。在匈牙利，卡达尔建立了一个由约200名经济学家组成的委员会。1957年底，该委员会建议大力下放权力，在比以往大得多的程度上靠经济手段管理经济。

1958年4月，南共联盟七大通过的南共联盟纲领，又招致苏联的攻击，其社会主义性质又受到怀疑。“修正主义”者在东欧又被视为主要敌人。波、匈的改革随之流产。哥穆尔卡对支持改革的“修正主义”分子喻称“肺结核”，对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喻称“严重感冒”，各打四十大板，并于1958年终止改革。卡达尔也被迫将改革委员会提出的报告贴上“修正主义”的标签束之高阁。还应当指出，前面提到过的1956—1959年期间各国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使一些人找到了为现存经济体制辩护的理由，这也是使改革归于流产的因素之一。

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也兴起了对现存经济体制的批评，改革的初步尝试也已开始。但种种原因（其中包括把

尚未废止的旧体制所产生的问题归罪于局部性改革的压力)使改革未得到进展。改革刚刚兴起,便落入低潮。

六十年代初期,一方面,苏美大搞缓和,提出东西方和平共处,另一方面,苏联及东欧各国经济颓势日渐暴露,其中,苏联以1958年为转折点。196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及其决议提出,以扩大企业权限,加强经济刺激、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经济杠杆及加强经济核算为中心的改革方向。1962年,苏联经济学家利别尔曼撰文倡导改革。由于此文刊登于《真理报》,给东欧各国以较大震动,几年前被压抑的改革之声再度震响,对旧体制的批判和对新体制构想因此得以展开和深入。

## 第二节 对传统经济体制的重新认识

当社会主义制度在地球上现实地生存了三分之一个世纪有余之后,对它的认识问题,重新变得紧迫起来。革命导师的理想,统治着社会主义现实中人们头脑的原则和社会主义经济现实,重新成为人们认真思考的对象。

根据革命导师的设想,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似乎不应该存在什么机会成本问题,就是说,人们不必去筹划利用一种机会可能是潜在地放弃了另一种什么机会,不必筹划潜在的机会损失会有多大。这是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用于满足人们需要的各种产品的品类将有极大的丰富,以致于人们不必去做相互排斥的选择。物质刺激、劳动纪律和工作动力问题那时又怎么会出现呢?共产主义的新人绝不会贪图